

解釋「中國」的困境

從近世歷史看中國之「內」與「外」

作者簡介：葛兆光北京大學畢業，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2009年被普林斯頓大學選為第一屆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

2012年底，我去韓國首爾演講，《朝鮮日報》的記者與兩位韓國教授來訪問我，他們看過我的《宅茲中國》這本書，於是，在訪談中提了幾個問題，第一是，中國現在是個傳統帝國，還是現代國家？第二，現在中國強大了，是否有恢復「朝貢體制」的想法，越來越膨脹的中國，將與韓國（等鄰國）如何相處？第三是，中國為什麼有國學熱，是否意味著要在文化上重新搞民族主義？他們質疑說，中國還有沒有真正的傳統文化（韓國保存了傳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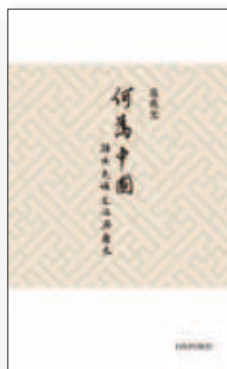
這些問題很有挑戰性。我總覺得，他們之所以有這些疑慮，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現在「崛起」了，可是，中國真的「崛起」了嗎？為什麼我總是覺得，正是因為表面的「崛起」，現在中國反而處在困境之中呢？因此，我要在這裡和大家討論一下，為什麼說，中國現在面臨困境？這些困境是怎麼來的？近世中國歷史給現實中國帶來的困境，為什麼中國至今走不出去？

作為一個專業學者，本來，我並不想討論這些大問題。可是，近年來我越來越覺得，

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現實和歷史總是互相關聯，學術和政治始終難以分開。最近，迅速膨脹（我不喜歡「崛起」這個詞）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內部、亞洲和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要承認，中國在這方面已經遇到很多麻煩。

這些麻煩，歸納起來，實際上就是三類，「周邊」的問題，「國際」的問題，以及「內部」的問題。它涉及了五個關鍵詞，「民族」、「疆域」、「宗教」、「國家」和「認同」。2012年，我參加哈佛中國基金會在上海舉行的一次會議，討論究竟有什麼重要的話題，值得哈佛中國基金會資助。記得

當時，大家七嘴八舌地提示，歐立德教授和王德威教授在黑板上寫，然後一個一個討論，最後，大家有共識的有二十多個關鍵詞，其中就有這五個，就是民族、疆域、宗教、國家、認同。我最近要在香港出版一本書《何為中國》，副標題就是「疆域、民族、文化和歷史」。當然，我不是「老王賣瓜」，在做海報自我推銷，但



作者關於「中國」的兩本著作。《宅茲中國》（2011），聯經出版社；《何為中國》（2014），牛津大學出版社。

是確實這些問題越來越引人矚目。因為它上聯歷史，下關現實，而且與中國將來的走向有關係。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討論，究竟什麼是「中國」？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它的疆域、族群、文化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為什麼既有現代國家的形態，又有傳統帝國的意識？這樣形成的現代中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麻煩和如此複雜

的困境？——這些問題，我都把它放在近世歷史裡面，所以，我的副標題就是「從近世歷史看中國之內與外」，這個「近世」，我們從宋代算起。

下面書歸正傳。

引子：假如宋代……：從澶淵之盟說起

說到「澶淵之盟」，人們都知道，就是宋真宗（宋代的第三個皇帝）景德元年（1004），契丹遼的蕭太后、遼聖宗大君率軍南下，在寇準的鼓動下，宋真宗御駕親征，雙方對峙之下，十二月，按照西曆算已經是 1005 年年初，宋遼兩國在澶淵，就是現在的濮陽一帶，訂立了盟約（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給遼銀子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在這一誓書中，有幾句話很重要，一是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二是這個條約式的文件裡面有兩句話說到，「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三是約定「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而且要「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1]。

這個事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可能現在還認識得不夠。通常大家都說「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我也贊成這一說法。可是，從 755 年的「安史之亂」到 1004 年的「澶淵之盟」，這個兩百五十年，是整個一個轉折時代。



宋真宗。（維基提供）

為什麼這麼說？我對於澶淵之盟前後中國歷史的變化，有一些還不成熟的想法，想和大家分享。

（1）宋代為什麼在這之後，開始出現什麼「天書事件」（大中祥符元年，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鸕尾上）、「泰山封禪」（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謁文宣王廟」（加封『玄聖文宣王』）、「祀汾陰」、「頒天下《釋奠先聖廟儀》」（大中祥符三年）、「撰《崇儒術論》」（大中祥符五年），這究竟導致了文化精英什麼樣的思考？我們可以想一下，為什麼澶淵之盟之後，要急於搞這些事情？而王欽若又為什麼要強調「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2]

（2）當時的權臣李沆曾經預言，當和平來臨的時候，皇帝便會生出「侈心」，「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他曾經告誡皇帝不要用「新進喜事之人」，並且對「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採取無為之法[3]，可是，後來的「三不足畏」，種種變法，根源是否就在這個時代？

（3）到了這個時候，宋朝才真正定型，所以，宋代文化也開始形成自己特色，在這種內憂外患背景下，才有了「宋初三先生」、有了「慶曆變革」，強調「崇儒排佛」，強調「尊王攘夷」，春秋之學和周禮之學的先後興起，都根源於此。無論是政治上的自我變化，還是思想上的理學崛起，文學上的宋代特色。

（4）文化上的南北逆轉。大家注意，在宋真宗朝搞得雞飛狗跳、使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的一個人叫王欽若，宋真宗早就想用他，可是，王旦卻提醒真宗說「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害得王欽若一直要到王旦死後，才得到大用，所以他抱怨說「為王公（旦）遲我十年作宰相」[4]，這裡說的「南人」一詞值得注意，南

方人過去不能當政，宋代一開始還是北方人掌權，可是，後來除了司馬光、富弼、韓琦等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等，卻都是「南人」，這件事情出現在澶淵之盟之後，也在可以偃武修文之後，它標誌著北人與南人的政治地位轉換，而北人和南人的地位轉換，又引起了政治策略和文化取向的轉換，這和後來的歷史有關係嗎？^①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胡漢問題」的變化，鄧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書裡面，說到宋代初期，胡漢問題逐漸消解，這很有意思。不過，我的看法是，胡漢問題在唐代是內部衝突，突厥、吐蕃、回紇相繼崛起，波斯、天竺人遷入，粟特、沙陀人處處皆是，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胡漢混融的文化共同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於是互相交融，也亂成一團。到了宋真宗的時代，澶淵之盟把胡和漢，也就是大宋和契丹，各自劃開了，中國內部的胡漢問題消解了，但是，胡漢卻變成了我與他、華與夷的外部問題了。

澶淵之盟的誓文非常重要，應該說，是安史之亂以後，中國歷史的又一個轉折點。大家知道，什麼是帝國？簡單地說，帝國就是皇帝控制廣大的疆域，管轄眾多的民族，這個空間沒有明確邊界。唐代是這樣的，唐太宗覺得自己是「天可汗」，無遠弗屆地掌控天下，可是，宋代不是，你看宋太祖，雖然覺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覺得自己是「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但是，就像錢鍾書講的，八尺大床變成了行軍床了，國力不行了，所以，無論南方還是北方，宋代都開始收縮。到了澶淵之盟簽訂之後，一個在民族上、疆域上、文化上和認同上都很清晰單一的漢族國家，逐漸形成了。

宋代「中國」：帝國疆域的收縮與有限國家的肇始

什麼是「帝國」，什麼是「國家」？這個問題很複雜，去年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到復旦

大學來，就講了「傳統中國作為帝國」，他分析了帝國概念和中國歷史，他認為只有清代算是帝國。至於這個說法對不對？我們先不管他，我們先回顧歷史。

我想簡單地說，中國作為一個在文化上有延續性，政治上大體上有同一性的帝國，其實兩千多年前就確立起來了，咱們常常說「秦皇漢武」，確實是在他們的時代，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這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貨殖列傳》裡面，「漢興海內為一」一句以下說的，西面是關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龍門碣石、遼東、燕涿，東面是海岱、江浙 [5]。儘管此後的中古時期，中國也經歷戰亂與分裂，諸多民族交融雜糅，各族首領互相嬗代，但一直到隋唐，中國仍然保持著一個對東亞具有籠罩性，對域內各個種族有控制力的大帝國。

中古時期，作為一個帝國的中國，它的特點是什麼呢？我想有以下幾點。（1）儘管邊緣常常變動，但中央區域卻相對穩定，形成一個具有基本疆域的政治、民族與文化區域，也構成了一個歷史世界。（2）儘管有「征服王朝」或「異民族統治」時代（如南北朝、五代），異族文化不斷地疊加進入，漢族為主的文化也不斷地凝固劃界，以漢族文化為主幹的文化傳統始終在這裡延續，構成明確的文化認同與文化主流，因此它也是一個共同體。（3）無論哪一個王朝建立，它們都自認為「中國」，也把王朝的合法性納入中國傳統的觀念世界（如五行、如正朔，如服色），二十四史、通鑑、十通等等漢文史籍，也反過來在文化上強化了這種連續性的國家觀念。（4）傳統文化中自我中心想像的「天下觀念」與依靠禮儀衣冠維持的「倫理秩序」，也增強了中國君主、大臣、知識人、民眾心目中的「國家」意識。

為什麼我要說中國是一個大帝國？因為，你要看到，漢、唐之間的千年裡面，在一般觀念世界裡，



宋代理約 1111 年之疆域圖。(維基提供)

不太有「外國」意識，也不太有「國際」秩序。疆域在逐漸擴大，民族也相當複雜。但是，這都是「中國」，儘管歷史上，周邊有匈奴，有鮮卑、有突厥、有吐蕃和沙陀，有種種可以抗衡這個帝國的異族力量，但總的來說，漢唐時代的觀念世界裡面，還不是真的有對等的「敵國」，更沒有若干個「外國」，它彷彿籠罩「天下」^①。

可是到宋代，澶淵之盟以後，中國和他的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 [6]，宋朝中國和唐朝中國大大不一樣。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越來越覺得大帝國是無法維持的，多民族是無法控制的，北宋的晁以

① 已經有學者指出，北宋武人精英在地域上主要來自河東、河南和河北，禁軍高級將領幾乎無一例外出身於上述三個地域。這和同時期的文人精英主要來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非北方地區的情況，恰恰形成顯著對比，因此他認為，中國社會到了十一世紀，由傳統上北方閥閱世家在政治上獨攬文武權柄的局面，一變而為南北共治、文武分離（即代表北方三大軍事集團利益的宋皇室，與以南人為主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十一世紀中國社會政治上的這一轉型，與同時期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這一歷史趨勢相適應。

② 請看二十四史，要一直到蒙元時代撰寫的《宋史》裡面，才第一次既有《外國傳》若干卷，又有《蠻夷傳》若干卷，有了「外」與「內」的明確分別，具有類似現代的「國家」意識了，宋代周邊的強敵環伺，正如 Morris Rossabi 所編一部討論宋代國際關係的論文集的書名 *China among Equals* 所顯示的那樣，在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棋逢對手」（也有人翻譯為「勢均力敵國家中的中國」），也正如它的副題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顯示的那樣，是這個時代，中國才意識到它存在於強大的鄰居中間。

道就說，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你是你，我是我。北宋人特別愛檢討唐五代的歷史，因為唐是一個不可企及的楷模，楊聯陞講的「朝代間的比賽」，宋代雖然老要說唐代，但是心裡明白，不可能「盡復漢唐故地」，那只是陸游做夢的時候想像的，寫詩可以，真的一點兒可能都沒有。

所以宋代人就一再說，中國和夷狄，是兩回事，井水不犯河水，很自然，像范祖禹，就是幫著司馬光修《資治通鑑》的人，他自己寫了一本《唐鑑》，就說唐朝管得太寬，其實華夷之間「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你「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必呢？唐朝李世民好大喜功，「雲南只是隨口封了，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只不過是「崇虛名而受實弊」。比他更早，在澶淵之盟前兩年的咸平五年（1002），就有一個叫張知白的人給宋真宗上書說，雖然戎狄貪暴好殺，但也是「天地之一氣，與中國絕異」，這就開始承認夷狄，不打算融合他們了，他說，「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有了內外之別，所以從宋代起，中國已經處在一個多國的國際環境中，自己開始收縮一個疆域有限、民族單一、認同明確的「中國」。

先說南方，傳說宋太祖曾經看地圖，拿起玉斧來比劃，說大渡河以南的雲南一片我統統不管了，所以，原本唐代還是中國的雲南南詔，到宋代就變成外國了。這個傳說有沒有根據？還是有的，宋代建立之初，對於雲南只是隨口封了一個王，辛怡顯《雲南至道錄》裡面引用官方冊封文書就說，讓雲南王（諾驅），「統轄大渡河南姚、嵩州界，山前山後百蠻三十六鬼主」，把異族的麻煩就掃地出門了。而且，真宗還頒布詔令（1009），約束邊界上的軍民，不要越過大渡河去滋事，「下詔戒敕，勿使相侵擾，又詔，邊臣不得輒入溪洞，邀功生事」[7]。

同樣在南方的南越，原本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980）的時候，就曾經藉交州丁氏內亂，派出侯仁寶等率軍，想把這塊地方收歸大宋[8]，傳為王禹偁所撰的勸降書曾經用身體作為比喻，說中國四周的蠻夷就像人身上的四肢，雖然南越只是一個指頭，但是一旦有毛病，也很麻煩，中國應當化蠻夷為中華，所以不得不去平定，如果他聽從文明那麼就原諒他，如果他反抗就要討伐他[9]。但是，隨著第二年（981）侯仁寶征伐交州失利，自己也兵敗被殺[10]，南越的黎桓建立起前黎朝（980-1009），一面自稱「明乾應運神武昇平至仁廣孝皇帝」，一面派遣使者到大宋來通好，這時，忙於應付北邊契丹的宋太宗，也只好承認南越獨立，黎氏當國的事實[11]。雖然後來黎氏王朝只有三十年，被李公蘊推翻，但是南越獨立成為事實，到了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承認李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便成為這個國家的國名[12]。

再看北方，宋太宗曾經想打到幽州，收復漢唐故地，可是屢戰屢敗呀，所以只好算了。那時有一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澶淵之盟」以前的咸平二年（999），就有一個叫朱台符的人說了，「北方之國，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他承認蠻夷「真中國之雄敵也」[13]，建議乾脆和遼國恢復以前的盟約。

到了十一世紀「澶淵之盟」以後，宋代人更加清楚，自己無法控制這麼大的疆域和這麼多的民族，所以乾脆算了。有個澶淵之盟的誓約管著，宋和遼可以很長時間相安無事。比如，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要去祭祀泰山，皇帝出動，要有六軍相隨，「恐契丹不察，妄生猜疑」就是怕遼國緊張，造成麻煩，就派了孫奭去通告，遼國就回書說，我們有誓約，沒有問題[14]。宋仁宗慶曆二年，富弼和符惟忠討論邊疆的問題，就說根據澶淵的誓約，「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還說「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而遼國那邊也同樣尊重誓約條文，說兩國在景德元年有約定，「沿邊州

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15]。只是不讓人民過多往來，也不允許中國的人、物、書籍隨便出境 [16]。

有一則資料特別有意思。《宋會要輯稿》記載，皇祐四年（1052），宋仁宗下詔讓學士院討論北宋與大遼之間往來國書。一般來說，「國書」的措辭，應當代表的是國家意志。當時，遼國文書中自稱「北朝」，而把宋國稱為「南朝」，但是，宋朝的官員經過認真討論後，認為「自先帝（宋真宗）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復有書，乃稱『契丹』如故」。這表明，當時在漢唐延續下來的這塊土地上，已經從「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稱南朝、北朝），改成「一邊一國」（要求各自稱呼「大宋」和「大契丹」）了 [17]。

這種新型的國際關係，從十一世紀初的澶淵之盟（1004），到宋仁宗慶曆時代（1041-1048），大概四五十年間，在皇帝和大臣中間就逐漸成了共識。和唐代很不一樣，宋代人不能不承認，對面那個契丹很厲害，慶曆三年（1043）韓琦《論備邊禦七事》裡面就向皇帝說，「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特別是文化上面，它也漸漸進步，他說，契丹和漢代的匈奴、中古的鮮卑、唐代的突厥都不一樣，那個時候，「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18]。

再看西方，「千里黃沙，本非華土」，說的是西夏就是今天寧夏甘肅一帶 [19]。宋代對於西邊兒，很早雖然有志打通，但很快也就放棄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宋朝內部就有爭論，劉綜認為，靈州（今寧夏靈武）一帶是「咽喉要衝」，不能放棄，但是，李至則主張「螯手斷腕」，放棄靈州。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有名的詩人楊億，也建議放棄靈武一帶，「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還說，你不要老覺得，放棄土地這是喪權辱國，如

果「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 [20]。

宋初的幾十年裡，北宋和西夏之間，戰戰和和，打打停停，一直到了慶曆五年（1045，正月二十三日），宋朝終於和西夏訂立了誓約，裡面還是宋遼誓約裡面說的這些話，宋代官方還三令五申，「約束當職官吏，沿邊守把人等，各守疆界，不得擅入夏國地分侵掠，及不得收接投來人口，致別生事」 [21]。一直到宋神宗初年（1068），有一個叫种諤的武官想邀功，帶兵進入西夏邊界，動員橫山一帶的土豪帶著族人歸順大宋，結果宋朝的大臣像有名的鄭獬、劉述、楊繪，都紛紛批評這種惹是生非的舉動，說「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其曲在我」，「有違誓詔，為國生事」，「失信于戎狄，生起邊事」 [22]。而司馬光、富弼等人也贊同這種意見。

所以，我認為，宋代中國已經在國際環境、領土邊界、貿易經濟、國民認同各個方面，有了初步的、類似近代的「國家」意識：

（1）遼、西夏、金、蒙古相繼存在，對等「敵國」的意識已經形成，《宋史》第一次區分《外國傳》和《蠻夷傳》，說明已經有一個內外分明的「國際」。

（2）有了「界」的觀念，各自「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說明政治上有了明確的邊界意識和領土觀念^①。

（3）「邊市」與「市舶司」現象的出現，說明

^① 比如宋神宗熙寧年間，沈括、韓縝等處理蔚州（河北蔚縣西南）、朔州（山西朔縣）、武州（河北宣化）、應州（山西應縣）一帶的宋遼劃界爭端，就是一例（參看陶晉生 [23]）。蘇頌曾編《華戎魯衛信錄》一書，保存兩國交涉文書，沈括也曾根據文件和圖籍，考察宋遼邊界爭端。富弼就曾經提出，「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為據，使其盡力交相詰難」，也就是根據地圖和檔案，通過談判劃定邊界（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二）。所以，除了陶晉生之外，不少學者都同意，澶淵之盟劃定的國境，已經接近歐洲現代主權國家的邊界（boundary）了 [24]。

經濟有了國家界限；而圖書進出口的限制，說明文化也有了國家界限。

(4) 宋代著名的「國是」觀念，以及對異族和異文化的拒絕，和對本土文化的強化，已經漸漸形成了近世的國家與認同。

正如張廣達先生比較「契丹」與「宋」的國家意識時所說的，「宋朝從此主動放棄了大渡河外的雲南，也告別了西域，西部邊界退到秦州（甘肅東南天水），西域開始穆斯林化，由此可見……趙匡胤追求的是鞏固自我劃定界限的王朝」[25]。只要有基本的歷史知識，就知道，這個時代已經與過去不一樣了。

現代學術界，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唐宋變革論」，強調唐代是傳統時代，而宋代是中國的近世？不僅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這一論斷，中國的傅斯年、陳寅恪、錢穆、傅樂成，也都有類似看法，宋代之所以成為「近世」，除了城市與市民的興起、貴族衰落與皇權專制、科舉、士紳、鄉里社會的形成，以及文學藝術的風格變化等等這些宋代新因素之外，「國家」本身也是所謂「近世」的一個標誌，所以，我會強調，宋代是「中國」意識形成的關鍵時代。

這一轉變相當重要，雖然傳統中國的華夷觀念和朝貢體制好像還在，但是實際上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在觀念上，由實際的策略轉為想像的秩序，從真正制度上的居高臨下，變成想像世界中的自我安慰；（2）在政治上，過去那種傲慢的天朝大國態度，變成了實際的對等外交方略；（3）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識階層關於天下、中國與四夷的觀念主流，也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義。

元、明、清：從歷史看「中國」的三重困境

假如中國就這樣，順著這個路數轉變過來，可能現在中國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前面一開始我說的那

些麻煩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了。可是，歷史學家雖然常常愛想「假如歷史怎樣怎樣」，但是，歷史學家卻最不能輕易地說「假如歷史怎樣怎樣」。以前，我的老朋友，復旦的周振鶴先生很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假如齊國統一中國」，他想呀，如果不是西邊兒的秦國而是東邊兒的齊國最終掃平六國，混一天下，中國是不是會變個模樣呢？這可不好說。

我今天也是這樣，一開始我說，假如——我說的只是「假如」——宋代歷史一貫而下，沒有後來的蒙元、滿清的領土擴張，也許今天我們對於「民族」、「疆域」、「宗教」、「國家」、「認同」的緊張和焦慮，可能都不一樣了。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設想這個「假如」，因為中國宋代以後的歷史，很有些詭異，它和歐洲不一樣呀。

宋代以後，這個漢民族的國家初具雛形之後，「中國」卻遭遇了巨大變化，這個巨大變化又帶來了更多麻煩，蒙元與滿清，兩次異族統治，造成跨越性的大帝國，中間的明代，又偏偏遇到大航海時代的西潮東來，這樣，從元到明，中國就被拖到一個更大的國際環境中，遭遇到極為特別的三重困境，這使得「中國」作為國家，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內」與「外」的承認與認同困境，而這些困境又構成現代中國的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甚至還會延續到未來。

那麼，究竟是哪三重困境呢？

第一重困境，是宋代以後，經歷了蒙元時代，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朝鮮、安南）陸續出現「自國中心」傾向。在中國不再有漢唐時代的文化吸引力與輻射力以後，它們至少在文化上不再願意依附於中國，也不甘心於在政治上承認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環繞「中國」的狀況。

比如日本。儘管從隋唐以來就已經有了與中國對等的自覺意識 [26]，但真正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全面「自國中心意識」，恐怕是從蒙元時代（1274，



左起足利義滿、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維基提供)

(1338-1573) 之後，足利義滿於 1392 年統一南北，在十五世紀初年（建文三年，1401），正好是建文和永樂爭鬥的時候，曾經試圖放低姿態，以稱臣納貢的方式，進入大明的朝貢圈，但是，大多數時候，足利、豐臣、德川三個武家政權，都是不認同中國中心的朝貢體

制的 [30]。

1281) 蒙古、江南、高麗聯軍兩次攻打日本，遭遇所謂「神風」而失敗之後才開始的^①。

蒙古一方面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把「中國」捲入「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統治和崩潰則刺激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意識。研究日本史的原勝郎（京都大學教授）、研究中國史的內藤湖南（京都大學教授）認為，「蒙古襲來」或者叫「元寇」（文永之役、弘安之役）的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從此日本便以「神國」自居 [28]，有意識地發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謂日本型「華夷秩序」，並不服中國中心的「華夷秩序」。這一觀念在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一直延續，在南朝，由於後宇多天皇（1267-1324）、後醍醐天皇（1288-1339）通過復古以求革新，支持新禪宗和理學，北畠親房（1293-1354）撰寫了後世影響極大的《神皇正統記》，提升了日本的政治獨立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對於原本文化來源的中國漸漸不以為然，產生了分庭抗禮的心情。

明朝初年，懷良親王（1329-1383）給明太祖的信中就寫，「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你雖然很強大，但是「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但是你如果來犯，那麼，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絕不會「跪塗而奉之」。日中之間，對等與對抗的意識已經很強了 [29]。儘管經歷了五六十年的南北朝之亂，但是進入室町時代

的 [30]。

再比如朝鮮。蒙元帝國曾經統治高麗，但是，正是在蒙元入侵的時候，高麗的民族認同意識卻開始興起，開始構造自己的歷史系譜和歷史象徵，日本有名的朝鮮史學者今西龍寫了一篇《檀君考》，就指出取代箕子的朝鮮始祖神檀君，原本並不是朝鮮民族全體的始祖神話，只是平壤一代有關當地仙人王儉的傳說和那裡祭祀用的薩滿儀式，正是蒙元入侵的危機時候，為了鼓舞、動員、認同，才逐漸變成全民族的始祖神的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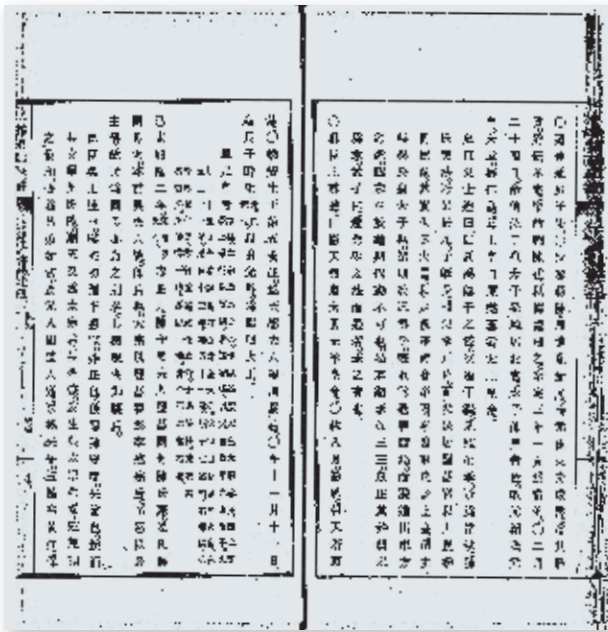
到蒙元解體之後，東亞各國陸續發生變化，李成桂建立的李朝取代高麗，雖然仍然留在大明朝貢圈裡面，顯然在文化上也有著越來越強的自立傾向。經過蒙元的統治時期，他們也越來越覺得，中國未必總是真理在握，也未必是文化正統，相反，他們覺得，自己的儒學更加純正，所以他們比中國還要嚴厲地推行「崇儒抑佛」政策，也通過國家力

① 元至元十一年（1274，日本文永十一年）、十八年（1281，日本弘安四年）、蒙元曾兩次入侵日本，均遭失敗。內藤湖南就曾經很強調蒙古襲來的刺激和足利義滿統一的意義，他認為，這是「日本文化獨立的契機」。一方面，蒙古統治中國，又來襲日本，大敗而歸，則導致日本自信「為神靈之國」、超越中國的想法，這是外在因素。另一方面，由於此時結束鎌倉幕府，進入南北朝時代，後宇多天皇、後醍醐天皇等南朝一系，主張宋學，試圖重建天皇統一政局，有改革思想（所謂建武新政），則是日本走向文化獨立的內在因素 [27]。



明朝末年西洋傳教士利瑪竇來華，此為 1602 年利氏在北京獻給萬曆皇帝的《坤輿萬國全圖》。(維基提供)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越南陳朝群臣勸進二代君主陳日烜（陳聖宗）為「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片段。（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

量推動社會上的道德倫理嚴厲化，像世宗十六年（1434）以後官方頒布《三綱行實圖》，就影響深遠地推行著「忠（臣）孝（子）烈（女）」。

中國對朝鮮不是沒有警惕，明太祖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曾經警告過朝鮮使臣不要搞獨立王國，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日頭那裡起，那裡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慢不得日頭」。但是，政治上的俯首承認，並不等於文化上的甘心稱臣，洪武二十六年（1393），李朝太祖就對左右說，明太祖以為自己「兵甲眾多，政刑嚴峻，遂有天下」，但是他「殺戮過當，元勳碩輔，多不保全」，反而總是來責備我們朝鮮，「誅求無厭」，現在又來加上罪名，要來打我，真像是在恐嚇小孩子。顯然對大明已經很反感了，只是考慮到大小懸殊，才不得不裝作臣服的樣子，所以別人問他怎麼辦的時候，他就說了一句「吾且卑辭謹事之耳」[32]。實際上，李朝朝鮮不僅政治上自有立場，文化上逐漸也開始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歷程，有趣的是，他們用來支撐文化自信的，恰恰是中國的朱子之學。

再看另一個周邊國家安南。從蒙元時代起就不

認同蒙古王朝，無論是宋代還是元代，都沒有真正征服過它，先是元憲宗蒙哥在宋理宗寶佑五年（1257）年，征服雲南之後，試圖從安南廣西夾攻南宋，派了兀良合台出征安南，可是失利，只好互相妥協，此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年間，陳朝又三次（1282，1284，1287）打敗了蒙元軍隊，到了元成宗時代（1294），只好互相商定，「三年一貢」，但是，實際上「其後難有聘使往來，而冊封之禮，終元不復行」（潘輝注語），安南國王陳日烜曾經自封「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而且還有自己的年號，叫做「紹隆」，與元朝分庭抗禮。到了大明王朝，其實也是一樣，明朝承認他們「限山隔海，天造地設」，雖然永樂皇帝也曾經想把安南「郡縣化」（有點兒像改土歸流），但是並不成功，特別是1428年黎朝建立，再次打敗明朝軍隊，它的自國中心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厲害。

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一旦統一，自我和自尊的意識就會很強。中國周邊的安南、朝鮮、日本逐漸形成了「自國意識」之後，便在政治上逐漸獨立，在文化上開始與中國分庭抗禮，這就出現了跟漢、唐、宋時代的「東亞」很不一樣的「國際格局」，這使得建立在「天下觀念」與「禮儀秩序」上的中國中心的國際秩序發生改變，也迫使中國逐漸接受這種變化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版圖。——這是來自周邊的第一重挑戰，即蒙元時代以後，中國「周邊」發生了變化。

如果今天的中國仍然沉湎在過去那種「天朝」、「上國」、「朝貢」的想像和意識裡面，它很難處理與它周邊這些國家的關係，可能引起種種有關領土的衝突。

第二重困境，是明代中期西洋人東來之後形成的。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約1450-1500）抵達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西班牙支持下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 到達印度, 1521 年葡萄牙人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 環遊世界, 到達菲律賓, 揭開了大航海的大幕, 也開始了早期全球化的時代。

在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1516) 一個葡萄牙人別斯特羅 (Rafael Perestrello) 隨船來到中國, 揭開西洋東進的序幕 [33], 大量傳教士來到東亞, 帶來了天主教信仰和近代歐洲科學。大明帝國這個重新以

漢族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國家, 從此被拖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中, 中國歷史也被整編進了全球歷史之中, 中國文化也面臨著歐洲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政治領域的「禮儀之爭」, 或者信仰世界的「上帝之爭」, 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拜祖宗問題的爭論, 其實, 對於「天」和「地」, 對於「君」和「臣」, 對於「道」和「器」、甚至對於「五行」和「四行 (四大)」的理解, 都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謂

「天不變, 道亦不變」, 可是這個「天」一旦變了, 「道」是不是要變呢?

這種「早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 在此後越演越烈, 一直到晚清, 西方人以「堅船利炮」打進來, 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 這使得「天下」逐漸變為「國際」, 以前跟中國沒有太多交集關係的、巨大的地理世界、歷史世界和文化世界出現了, 那麼, 到底誰的制度適應這個時代? 誰的價值能夠支配這個世界? 誰的秩序能夠統馭這個國際? 「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 ——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二重困境, 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文化和秩序的挑戰。

如果今天的中國始終固守朝貢體制的心態, 總是覺得不願意在思想文化上接受「他者」, 那麼, 和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價值觀念會發生衝突。

第三重困境, 則是大清帝國版圖擴大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問題, 這是最最麻煩的事情。前面說到, 宋代中國, 已經逐漸收



瓜分中國大餅的列強：左起維多利亞女王（英）、威廉二世（德）、尼古拉二世（俄）、瑪麗安娜（法）、武士（日）。清朝大臣在後方無力回天。這是 1898 年初的法國政治漫畫。
(Henri Meyer 繪製, 維基提供)

縮，但是中國歷史進程一波三折，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國，又把原來在中國中心區域逐漸形成的漢族國家改形移位了。蒙古在中國建立「元帝國」，也把原來宋代收縮的時候劃出去的地方，又收回來了，《元史·地理志》就說到，「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

其中，最明顯的是雲南，宋代已經是「外國」的雲南，蒙元時代又成為中國。正如1934-1936年間，陶雲逵對雲南麼些族進行調查，他撰寫的《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就指出，「唐初迄宋末，雲南土族，在地方上握有實際政權，漢官實等於虛設，一切均是羈縻性質。至元世祖平滇，土族勢力始漸漸消滅。元於開闢雲南功績最大，沒有他這一陣狂風，雲南到現在是否屬於中國，實是個問題」[34]。這話反過來說，就是在元代以後，當地土族勢力的消退，使得這個邊地與異族都納入了大中國。

可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雖然雲南在明朝中國仍然留在中國版圖之內，但是明朝的疆域又回到了本土十五省（見《四夷圖》），那個時候的人承認，「酒泉」就是「中國絕域重地」，「嘉峪關外即非我所有」了。在這個主要是漢族的疆域中，族群與地區問題並不很突出。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樣了：

一，滿清入關之前，天命九年，後金降服蒙古科爾沁部，天聰九年（1635），滅蒙古察哈爾部，成立蒙古八旗；崇德七年（1642），又成立漢軍八旗，應該說，進關之前的後金，已經是滿、蒙、漢的混合帝國了。順治元年（1644）滿族入關建立大清王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為大將軍，收復澎湖、臺灣，清帝國佔有了全部明朝版圖；「中國」由明代漢族為主的中國，變成了兼有整個蒙、滿、漢，遠遠超過明朝的大帝國。

二，康熙二十七年（1688），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汗部），由

於準噶爾的入侵而歸降清朝。二十九年（1690），康熙皇帝親征準噶爾。當時準噶爾佔有西部（今新疆、西藏、青海、川南、甘肅西部、內蒙古西北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打敗準噶爾，其領袖噶爾丹自殺。從此，整個內外蒙古、青海等地區歸入版圖。

三，最終，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入伊犁，二十四年（1759）清朝軍隊進入喀什噶爾（新疆喀什）和葉爾羌（新疆莎車），最終平定準噶爾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爾，有了新疆（回部），中國更成為合滿、漢、蒙、回為一體的超級大帝國；有人就說，1759年這一年就是中國版圖的最大化年頭。

四，從明朝開始到雍正時代基本實現的「改土歸流」^①，西南的苗、彝由原來的土司土官治理變成國家控制下的州、府、縣、廳，這時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

五，西藏地區由於宗教緣故，一直與蒙古關係密切，在元朝就是這樣了（如八思巴為帝師，創蒙古文字），明朝雖然並不能佔有西藏，但宗教往來也很多，如宗喀巴由西寧入藏創黃教。近年來，卓鴻澤對明朝皇室中的藏密影響的研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清朝有滿洲、蒙古，後來又有回部，所以與西藏的關係就更密。那個時候，黃教統一了蒙古和西藏，但政治上，卻是蒙古統一了青海西藏，從順治到乾隆，冊封班禪（順治四年即1647年冊封班禪為金剛上師）、達賴（順治九年1652年達賴赴北京朝見，受冊封），雍正六年（1728），清朝在西藏設置「駐藏辦事大臣衙門」。為了班禪、達賴的覲見，清朝在承德建立藏密寺院（仿照扎布倫寺建外八廟）。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打敗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大清朝廷制定《藏內善後章程》，派福康安到西藏，確定金瓶掣籤制度，中國更成為「五族（滿蒙回藏漢）」或者「六族（滿蒙回藏漢苗）」的國家。

嘉慶二十五年（1820），清朝重修《一統志》，

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經包括了二十七個區域，除了原來所謂內地十八省之外，還包括盛京三將軍（盛京即奉天將軍、吉林【初為寧古塔】將軍、黑龍江將軍）、蒙、藏、準、回等，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簡單的民族（漢）和國家（中國）重疊^①。

雖然一個東到庫頁島，西到新疆疏勒，北到烏梁海和外興安嶺，南至海南島這樣一個龐大帝國很值得自豪 [36]，可是，隨之產生的內部認同問題卻很嚴重，在清代後期，也曾經試圖改變原本的政策，強化統一國家，如 1880 年代新疆建省，1900 年禁止滿洲移民東三省，1907 年建立東三省，甚至探索過西藏是否可以建省，也曾派員巡視各省。光緒年間也提出要實行新政，建立「主權國家」，但是，龐大的統一國家、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複雜的認同問題，卻同時延續下來。

1911 年辛亥革命，帝制中國改為共和國制國家，雖然革命派像章太炎、孫中山、陳天華等等一開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民族革命的口號來動員民眾，但是，這個原本以「排滿」恢復漢族政權開始的革命，最後卻因為誰也不能承擔「分割國土」的罪名，不得不妥協並接受保守派如梁啟超、康有為等關於國族的主張，承認清帝「遜位詔書」中希冀的「五族共和」。但是，接受了大清帝國遺產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繼承了大清帝國隱含的龐雜的族群與地區問題，即滿蒙漢回藏苗怎樣才能有一個國家的共識和文化的認同。——這構成了「中國」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處理內部各個族群對於國家認同的困境。

如果中國始終不自覺地以漢族為中心，則無法處理內部的族群問題，更何況很多族群問題，既涉及宗教信仰，又涉及域外民族。

前些年，許倬雲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上演講，後來出版了一本書，叫作《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非常精彩也非常清晰，他說到，宋代已經是「列國體制下的中國」。

不過，宋代以後的中國，這個「我」和「他」、「內」和「外」實在是很難區分，彼此糾纏，弄出很多很多的麻煩來。由於現代中國繼承的是蒙元以來逐漸變動的周邊關係、明代以來的國際環境，清朝最後達成的內部複雜的民族國家，所以，我在 2011 年出版的《宅茲中國》一書裡強調，「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如果中國仍然停留在天朝想像中，那麼，它仍將面臨內部、周邊、外部的三重複雜的歷史問題 [37]。

就這個意義，「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②，它又像傳統帝國，又像現代國家，歐洲的近代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在中國並不太適用，而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它的現實困境，又需要從歷史中去理解。

① 江應樑指出，改土歸流從洪武二十一年（1388）沐英征服越州的龍海、阿資，設越州衛開始，一直有改土歸流的舉措，清代順治十六年（1659），元江改流，康熙四年（1665 年）蒙化改流，同一年，革除教化、王弄、安南三個長官司，設立開化府，實際上到雍正年間仍然沒有完結，根據魏源《聖武記》的記載，雍正時代四川還有長官司（土司）二十六、貴州有長官司六十二，廣西有長官司三，雲南就更多了，有長官司三、土府四、土州四等等，參看 [35]。

② 元代的傳統中國地區，分十一行省，即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湖廣、江西、江浙、河南、遼陽、嶺北、征東，而明代的漢族中國疆域則分為「十五省」，即兩京（京師、南京）以及十三個布政使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江西、湖廣、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因為元代叫做行省，所以，明代布政使司也可以稱「省」。到了清代中期，則將本部分為十八省，即直隸、江蘇、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甘肅，此外，滿清發祥地則有盛京三將軍（盛京將軍治奉天，吉林將軍，原為寧古塔，黑龍江將軍）治理，以及被叫做「藩部」的蒙、回、準、藏等。

③ 多民族、多區域構成的國家，是否就一定傳統帝國而不是現代國家？是否就一定要以聯邦制度而不能是統一政府？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于逢春在《中國國民國家構築與國民統合之歷程——以 20 世紀上半葉東北邊疆民族國民教育為主》（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指出，「『作為多民族國家的近代中國』，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對歐美列強與日本『由單一民族構築國家』的論理挑戰」，「在今天，『多民族可構築近代國家』雖然是一般的常識，但在 20 世紀前半的世界卻不被認知」（7 頁）。

左右為難：怎麼理解「中國」的兩面性？

那麼，你怎麼理解這個「中國」？過去有幾種看法，很值得討論：

(1) 早期一些日本學者，覺得「支那無國境」，「支那非國家」、認為中國應當回歸長城以南，成為一個單純的漢族國家。這些日本學者不再把「大清帝國」看成是一個「中國」，而是借用當時歐洲流行的「民族國家」新觀念，把過去所謂的「中國」解釋成不同的「王朝」，而這些王朝只是一些傳統帝國，而實際的「中國」只應該是漢族為主體，居住在長城以南、藏疆以東的一個國家，而中國周邊的各個民族，應當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

同體，所謂「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只是中國之外的「周邊」。

這種學術觀念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它轉化為思想潮流和外交政策，使得日本文化界和政治界形成了「中國應當強化中央而放棄四裔，日本應當與西方列強爭奪中國周邊控制權」的想法^①，也使得他們對滿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鮮都產生了「有如國土」的感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923年，日本著名學者矢野仁一就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

(2) 現代學界按照歐洲標準的「民族國家」樣式，傾向於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即並沒



1910年的中國帝國地圖。圖中的淺黃色地域包括滿州、蒙古、土耳其斯坦（新疆）、西藏，就是中國（黃色）的周邊。（維基提供）

有實質政治同一性的大帝國（有人說是「文明國家」）？這種說法在貶斥中國的時候，它與前一種觀念一樣，覺得中國始終沒有從「帝國」變成「國家」，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完成國家的現代轉化，但是在吹捧中國的時候，就會把它說成是越出普遍法則的「獨特道路」的基礎。季辛吉《論中國》（Henry Kissinger, *On China*）和英國人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就是這樣看的，而一些國內總是希望強調中國特殊性的學者也是這樣看的。因為一直以來，為了解釋中國的疆域和族群的包容性，很多學者都喜歡說，中國是「文化」高於「種族」，根據是什麼？就是孔子願意居住在九夷啦、夷狄和華夏可以互相轉化啦等等。

（3）按照後現代理論，「中國」是一個沒有同一性，只是一個依賴想像建構起來的共同體。後現代歷史學理論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中，也包含了對近代以來現代民族國家正當性的質疑。特別是，自從「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問世以後，對於從現代的民族國家反觀歷史的質疑，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研究中對於「國家」的誤解，指出我們常常習慣於用現代國家來想像、理解和敘述古代國家。因為，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

但是，後現代歷史學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與論據，一方面來自產生於殖民地經驗^①，如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如非洲的大湖區的部族與國家，另一方面來自歐洲的近代歷史，歐洲近代確實有民族和國家重構的普遍現象。可是，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分裂，但因為一有覆蓋更廣的「漢文化」，二是經歷了秦漢一統，習慣認同早期的「華夏」，三是中心和邊緣、「漢族」和「異族」有大小之差異，所以，政治、文化與傳統一直延續，所以既沒有所謂傳統「文藝的復興」，也不存在所謂「民族國家」的重建。所以，我們要

反過來問，第一，歷史學家是否要考慮與歐洲歷史不同的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第二，中國尤其是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是「偶然的」和「爭議的」嗎？第三，中國是一個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漸建立的民族國家嗎？

可是這些看法，都不是從歷史角度看的。如果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我們只能說，「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一直到近代，也依然是這樣。以前，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裡曾說，近代中國是一個「從天下到萬國」的過程，也就是從朝貢體系的宗主漸漸轉變成現代國際的一國。但我覺得，更加應當補充的是，近代中國也是一個「納四裔入中華」的過程，從大清到民國，在維護「中華民族是一個」（傅斯年、顧頡剛語）的追求中，也把多民族帝國的傳統維持下來了。所以，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非常非常特殊。

這個問題，我將在下一講裡面仔細講^②，這裡就先忽略。我只是想強調的是，現在的這個中國，一方面是逐漸有限的「民族國家」，一方面又是無

① 像福澤諭吉 1898 年發表的《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論》、中島端 1912 年發表的《支那分割の運命》、酒卷貞一郎 1917 年發表的《支那分割論》等等，都有類似看法。而內藤湖南在 1914 年發表的著名文章《支那論》中，雖然反駁這個說法，但也認為所謂「五族共和」的中國只是空想。

② 如果把這種理論套用到中國來，就有問題了。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是印度裔美國學者，印度經歷過英國殖民，南亞被後來硬性劃分為孟加拉一塊、巴基斯坦一塊，克什米爾地區，至今也搞不清歸屬，所以，印度經驗讓這些學者比較容易接受有關國家的後殖民理論，比如出生於印度的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還有巴巴（Homi K. Bhabha）。他們站在自身感受、經驗和立場上，闡發後現代史學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和論據，有他們對的一面；在這種被撕裂的族群和國家的重建中，確實有按照西方的民族國家，重新建構歷史的現象。但是，這套理論不能拿來說中國，因為始終延續的中國，並不是在近代才重構的新的民族國家。

③ 指同為「丘鎮英學術講座」四天後的第二場演講（納「四裔」入「中華」）。

邊的「傳統帝國」，一方面用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制度和邊界，一方面又無法完全實現同一性國家的「認同」。所以，我在 2011 年出版的《宅茲中國》這本書裡說，中國「並非（像歐洲那樣）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著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而歐洲的近代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在中國並不太適用，而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需要從歷史中去理解。如果不注意這一點，我們仍然無法理解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是現在這個「中國」，為什麼到了它的現代，仍然既像一個現代國家，又像一個傳統帝國？

其次是當下中國為什麼仍然處於我所說的，周邊國家的離心傾向、現代西方大潮之衝擊，與內部不同族群與地區認同之「三重困境」之中？

再次是中國學術世界與思想世界，何以既追求國家轉型的現代意味，又特別強調國家的「多元一體」，特別不容易捨棄「漢化」或者「涵化」這樣描述中國的方法。

這一問題，我下一次演講的時候，會重點講，這裡就簡單地提一下。

正是由於現代中國繼承的是宋代以來逐漸變動的周邊關係、明代以來的國際環境，也繼承了清朝最後達成的內部複雜結構的國家，所以，我一直強調，「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可是，由於中國一方面積貧積弱，被欺負得夠嗆，但另一方面又曾經威加四海，歷史上也闊過，現實中大國的歷史記憶也沒有被打斷。換句話說，一方面淪為「東亞病夫」被人欺負，一方面又仍然停留在大一統天朝想像中^①。所以，它不僅面臨著內部、周邊、外部的三重複雜的歷史問題，而且在中國被逐漸拖入「近代」的時候，思想文化世界也出現了左右為難的現象：

第一是「現代」。近代中國一方面把西方現代國家的法律、民主、科學、技術看成是導致「富強」的，必然的和理想的途徑，覺得自己也應該迅速「現代」並從此走向「未來」，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強席捲世界進入中國，看成是弱肉強食的野蠻行徑，也是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覺得中國應當另闢蹊徑，拋開西方的現代之路，走出另一個新的現代。

事實上，強調所謂「多元現代性」，即表現了一種相當尷尬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必然性，一方面努力要捍衛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上的自主性，並試圖用「多元」來尋找想像上的和理論上的自我解釋途徑。

第二是「國家」。近代中國一方面在觀念上接受西方現代以「民族」為「國家」基礎的論述，覺得建設現代型的民族國家，就是像西方一樣追尋「文明」，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傾向於中國歷史上以「文化」為「國家」基礎的現實，覺得必須捍衛漢唐以來，特別是清代以來「光被四表」的、大一統的多民族大國 [38]。

第三是「文化」。近代中國一方面傾向於把自己作為東方文化之巔峰，與西方相提並論，故「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的說法成為習慣，一方面它又必須證明自己的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代表，還要與日本（東方之西方）相競爭 [39]。

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世界中，最複雜、最無法調和的矛盾與衝突，而這些矛盾與衝突，都來源於近代中國仍然具有「國家」與「帝國」雙重性質，一方面，它的歷史悠久與傳統強大，可是另一方面，它在近代飽受欺侮和衝擊。這是一個既沒有經歷過徹底殖民的歷史，沒有喪失文化主體性的「（多）民族國家」。正是因為現代中國的國家很「特殊」，文化很特殊，所以用歐洲所謂傳統「帝國」或近代「民族國家」的定義，來簡單說明「中

國」是有問題的，這既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也不能理解現代中國有關疆域、民族和國家的種種現象。

不是結論，只是結語：走出困境的途徑何在？

回到開始的問題。正是因為中國既是一個現代國家，又是一個傳統帝國，它既要遵循民族國家的制度，按照國際條約進入世界，又要維持歷史的輝煌、廣大的疆域、眾多的民族，所以，它在「內部」、「周邊」和「國際」上都遇到了嚴重麻煩，在「現代」、「國家」和「文化」上都面臨著兩難處境，這些困境當然有它的歷史根源，這就是我上面講的從宋代以後逐漸形成的「中國」的三重困境。那麼，現在的中國，怎樣才能走出這種「認同」的困境？

前些時候，我在國外和國內就這個話題演講的時候，有人已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不是思想家或者政治家，而只是一個歷史學者，當然無法對這樣龐大的問題給出最終「判決」。但是，這裡我也願意嘗試著提供我的思考：

第一，在各種「認同」中，需要承認，最重要的是制度的認同。一個可以執行的，給人們提供安全、幸福、尊嚴的制度是最重要的，改變現在的制度，讓它成為國民安全、幸福和尊嚴的保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超越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差異，引導中國走出「認同」困境。

第二，在現代思想世界中，理性「分化」相當重要。如果我們同意，（普遍的）文明和（特殊的）文化總是會互相衝突的，我們的理性能夠對「文明」和「文化」進行區分，那麼，我們可能不會對全球化、現代性和普世價值（這也是一種「文明」）有那麼強烈的排斥感，覺得那是西方文明在摧殘著中國文化。其實，問題只是如何在趨同的「文明」普及大趨勢中，讓存異的「文化」在各自的世界中還能保留完好。

第三，在面對現代國際秩序的時候，不要急於通過傳統的「天下體系」或「朝貢體系」，來取代這種近幾百年來業已成熟的秩序。要形成有限國家（其實是政府）的自覺意識，懂得與鄰居和家人平等相處，也要清晰地意識到（1）傳統「疆域」與現代「領土」、（2）傳統的四裔與現代的族群、（3）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識形態、（4）國家與政府之間的本質區別。過去所謂的「韜光養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談判和協商」的方法，不完全是策略，更是尊重現代國際關係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夠消除周邊諸國與內部族群的疑慮。∞

本文參考資料請見〈數理人文資料網頁〉<http://yaucenter.nctu.edu.tw/periodical.php>

本文出處

本文修改自 2014 年 2 月 20 日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學術講座」演講。

延伸閱讀

- ▶ 葛兆光，〈納「四裔」入「中華」〉，《思想》27 期（2014），聯經。這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學術講座」的第二場演講（2014 年 2 月 24 日）。足供本文論點之延續與參照。
-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聯經出版社；
- ▶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2014），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① 由於不是歐洲那種內發型的近代化，近代中國的「追求富強」本身，一開始就因為外在型而蘊含矛盾：一方面，歷來天朝的自負與一再失敗的創傷，使得中國人打量彼此時，始終從這一現實出發，既然失敗是由於貧弱造成，因此一定需要比對手更加富強，既然受辱是由於船炮不如，從而現代化一定要從武力提升開始。所以，中國的近代動員力量中，富國強兵的技術化追求趨向就相當濃烈，而所謂「進化」也常常是一種競技比賽似的生死較量。另一方面，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在西洋東洋人逼迫出來的，因此現代化就始終從「制夷」的角度出發，民族與國家的情結始終在其中起著最大的作用，後來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也是這一情結的產物。雖然梁啟超說，與歐洲國家主義不同，「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其政治倫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故目的在乎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組成天下之一階段」（合集「專集」之五十，9 冊，2 頁），但是實際上「天朝想像」仍然在「現代國家」外衣下滋生，並鼓動「國家意識」膨脹為「國家主義」，並且很容易撐破這件外衣。